

史静寰 主编

*Z*OUJIN JIAOCAI YU JIAOXUE
DE XINGBIE SHIJIE

走

进

教材与教学的性别世界

教育科学出版社

史静寰 主编

..... **走**
进 教材与教学的性别世界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京 ·

责任编辑 鲁 民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张 珍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进教材与教学的性别世界 / 史静寰主编.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6

ISBN 7-5041-2755-8

I. 走... II. 史... III. 学校教育-男尊女卑-研
究-中国 IV. G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5722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46 号

邮 编 100088

传 真 010-62013803

市场部电话 010-62003339

编辑部电话 010-62384600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423 千

定 价 33.00 元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本书是富有开创性研究的成果。史静寰教授在本书的前言中指出，中国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争取实现学校教育中的性别平等。但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并不容易走。它需要各级人士的参与，包括：没有偏见的政府领导、积极参与的学生、全心投入的教师、远见卓识的管理者、积极支持的父母，以及像本书作者这样的富有创新精神的教师、教育工作者和学者为争取社会公平做出的努力。也许我们难以让所有人，尤其是教育资金和资源匮乏的贫困地区的人都相信：只有让女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才能说明全民受到了最好的教育，塑造男孩女孩、使其具有自我意识和抱负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一个个孩子、一个个班级、一个个家庭的进行。

当然，不仅中国面临挑战，教育经费不足，阻碍实现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机会和成就的地区性和历史性因素，社会和学校课程中存在的性别偏见等都是为全世界教育工作者所熟悉的问题。

由于实现学校教育中的性别平等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所以本书中的一些结论必然会引起北美读者的共鸣。1992年，美国大学妇女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发表了一份颇具影响力的报告——《美国中小学女生教育的缺欠》（*How Schools Shortchange Girls*），此后陆续出现了许多其他的出版物，如1994年的《公平的失败》（*Failing*

II 走进教材与教学的性别世界

at Fairness), 1999 年的《性别鸿沟: 学校教育的失败》(*Gender Gaps: Where Schools Still Fail our Children*) 等, 它们均记录了美国学校的教学材料、教学实践以及学生、教师和管理者中仍然存在的性别歧视。虽然就如何诠释性别歧视的程度和表现形式还存在争议, 但北美的许多教育者和本书的学者在一个观点上形成共识, 即, 创造公正的学校和社会需要挑战并改变传统的性别关系。例如, 下面由博特 (Gail Boldt) 讲述的故事就说明一个美国小学教师是如何建设性别敏感课堂的。

一天, 我正在夏威夷火奴鲁鲁的课堂上为三、四年级的学生读故事, 这时, 有个男孩大声地对另一个正在纠缠他的男孩说道: “你这个女孩!” 我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不情愿地告诉我, 这是男孩子们互相侮辱对方时的常用语, “就像叫别人丑八怪或笨蛋一样”。我看了看在场的女孩, 她们并没有作出明显的反应。我为那个男孩的话感到不安, 也为女孩子们的沉默感到不安。我问她们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 这时有个女孩回答道 (她的语调比我自己的还要镇静), 她们已经习惯了男同学做出比女生强的样子, 有时候女孩子们只是不理睬而已。(Boldt, 2002)

据博特回忆, 一开始, 她对这些男孩和女孩的行为感到沮丧和生气。生气的是男孩子们对自身产生的优越感, 沮丧的是女孩子们对男同学带有贬抑性质的语言和举止采取了被动接受的方式。但慢慢地, 博特开始重新评价女孩子们拒绝反击的真正含义。她意识到, 尽管自己致力于教育平等, 但自己却从消极的方面解释女孩子们的这种缺乏回应的行为, 而对男孩子却认为他们具有自信, 愿意表达自己的愿望。这一重新认识让博特想起了当她让学生打扫教室时发生的一件事情。班上的女学生高兴地做着打扫工作, 对一些男生袖手旁观并无怨言。尽管博特表面上批评男生不帮助女孩子们, 内心还是认为他们聪明机智, 能有办法让女生承担所有的打扫任务。她问自己, 为什么会嫉妒男生呢? 为什么她不能高度赞扬那些成功完成本要求所有人参与的打扫任务的女孩子们呢? 而且, 为什么她只用老套的性别术语来看待整个事件呢? 为什么她没注意到有些女孩子也没有在打扫, 有些男孩子却在打扫呢? 为什么她不问全班 “我让你们每个人都打扫教室, 为什么有的人却不这么做”, 而单要问男生为什么他们没有人在打扫呢?

博特从这类课堂互动中了解到, 她不该把女孩子们看成被动的或无力的。事实上, 博特重新思考了她对力量及力量和性别关系的看法。她不再把力量看成一样东西 (男孩子有, 而女孩子没有), 而是看成一种行为 (performative)。力量是人们表现出来的, 而不是拥有的。因此, 她开始明白男孩子们在对女孩子说粗

话或不打扫教室卫生时，他们的行为是在“表现力量”。同样，女孩子们拒绝回应男孩子的贬抑行为，实际上是拒绝参与他们的力量表现行为，拒绝让男孩子们有机会以大声地、不断地说她们“愚蠢”为乐。

不管我们赞不赞同博特的解释，她的故事揭示了在建设性别敏感课堂上几项重要的事情。首先，我们看到，即使是一个有着最美好愿望的教育者也很容易固化那些无意识地忽略女孩子的行为和观念。第二，博特的故事表明，建设能支持所有儿童的学习环境是很困难的，因为孩子们的需要和行为似乎能够破坏性别敏感课堂的研究。第三，博特的故事告诉我们，创造性别敏感课堂要求教师能认真倾听学生的声音。对伯特而言，一个真正的性别敏感课堂的建设始于她承认自己和学生一样，可能会持有矛盾的、偏见的或利己主义的价值和观点。所以，教师们需要更加仔细地思索孩子们（和成人）在说出带有性别规范的语句时，他们真正的行为所在。教师们需要理解孩子们在构建自身身份时、在对争议性话题进行开放式讨论时以及在教室的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压力。伯特谨记这一点，并制定出一条简单的课堂守则，以帮助学生们调解这类讨论：“无论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在这个教室里，我们总是努力让事情变得公正。”

最后，博特的故事说明，认识到学生自身的知识体系和作用（agency），对建设一个男女学生都能受到尊重并取得成就的课堂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博特的重点不在于教给学生正确的性别角色，而在于让他们通过问题参与到思考的过程中来。在我看来，这一点也是本书许多研究所要表现的主题之一。而且，也表明教育者对性别敏感教育采取了更为广泛的视角，使学生参与了书本教学以外的知识学习。性别敏感教育还包括重要的文化成果：“（1）人的尊严、自尊和自信感；（2）社会合法性，属于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群体；（3）个人和社会力量，影响决策、协商日常生活事务的能力。”（Stromquist, et al, 1998: 401）

对性别敏感教育的广泛定义和本书的另一主题相一致，即课堂教学不仅是知识和信息的交流，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由于教与学需要有人际互动，课堂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以学生为中心，要求教育者密切关注学生的体验和声音。所有学生学习的课程都理应包括他们自身的经验，所有学生都理应感受到教师对自己的关注。这样，学生才能了解自身的重要性和地位。他们才能知道自己的体验及自身在学校的公共空间里得到了认可，获得了价值。

为创造这样的课堂，教师们必须像伯特一样，努力去了解自身的性别身份和偏见。这就提出了本书涉及的第三个主题：需要将性别教育的材料和经验纳入教师教育，以帮助教师们开展批判性自我反思。（各级学校教育的）教师常常会不自觉地向学生传达性别信息。当然，性别敏感课程对教师的要求很高，如果课程改革要取得成功，首先必须要考虑到并尊重教师生活、工作的复杂性。在一个教师忙碌的一天中，他（她）要承载的东西很多，怎样才能搞好性别敏感教育呢？

IV 走进教材与教学的性别世界

为了帮助教师，从事女性研究和教师教育的研究人员和学者必须联合起来，加强在教师发展和性别培训方面的合作。本书的最大特色之一，就在于它是这种合作的结果，这种合作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一个可自由探讨更加平等、关爱的学校教育的论坛。

很可贵的是，本论文集的众多作者提醒我们，不论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我们在学校中的身份、我们学习和教育的方式、我们在课堂上和操场上对待他人的方式及与他人的关系、我们如何说话、如何运用身体以及孩子们带入学校的知识，所有这些都具有重要的性别维度。由于性别植根于我们的日常文化和个人生活中，由于我们无法跨越自己的生理性别，由于文化中充斥着对男性和女性应如何行事、男性和女性的关系、男性和女性应是怎样的想当然的观念，人们很难鉴别并批判性地审思性别问题，更别说改变。我们已经习惯了学校的组织方式和学校所教的课程，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擦亮眼睛，非常努力地去评估学校和学校的课程。

分析教材和教室中的性别文化，旨在从我们的视线中消除学校教育中那些看似“自然”的现象，同时也可以证实男女学生在学校里怎样学习及为什么这样学习。性别敏感教育也仅仅在于培养对问题的认识。女孩在中国的初等和中等学校学生人口中占了近50%，而且女大学生数量增长也很快。当然，所有国家的教育者都必须确保他们的学生能把学校当成充满支持、包容和爱心的集体。

但这个主张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帮助所有的女孩子和男孩子们在一个能听到所有声音、培养所有才能、支持并帮助所有学生实现期望的环境中发挥出最大的潜力，学校从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学校本质上更趋向于保守，而非革新。学校更多的是反映而不是改变文化传达的信息。事实上，和媒体驱动下的光鲜亮丽、强大、极具吸引力的大众文化（具讽刺意味的是，有时候它被称为公众教育）相比，学校的信息似乎越发微弱、谨慎及缺乏情感效应。

我们一方面努力确保学校促进平等，帮助男女两性发展社会性和自立能力，一方面又对学校作为社会变革的载体充满失望。虽然“学校常被看成促进个人社会流动性和社会集体进步的主要机构”（Stromquist, et al, 1998: 398），但它同时也维持着社会的等级秩序。学校课程既不中立，也不可预测，它们既可解放人，同时也控制着人。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永远都无法建立一个完备的课程。建立性别敏感课程必须持续不断地挑战对世界根深蒂固的认识。本论文集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 参考文献

1. Boldt, Gail Masuchika. "Toward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Gender and Power in an Elementary Classroom", *Current Issue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5 (1) —article 2002.12.16.
2. Stromquist, Nelly, Molly Lee, Birgit Brock-Utne, "The Explicit and the Hidden School Curriculum" in Nelly Stromquist, (ed.), *Women in the Third World, An Encyclopedia of Contemporary Issues*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8.

目 录

序 / 海迪·罗丝

导言 走进教材和课堂教学的性别世界 / 史静寰 (1)

上编：教材、读物文本的性别文化研究

从《宝宝家庭课堂》看性别角色的社会化 / 刘雅琴 (39)

性别差异知多少——《父母必读》的性别分析 / 何梦燧 (46)

现实生活与童话世界的对话 / 罗佩珍 (55)

从性别视角看小学《社会》教材的改革 / 易进 (65)

尚待开启的窗棂

——《综合实践活动·生活》教材的性别分析 / 卓挺亚 (74)

隐形而失声的女性——小学语文教材性别文化的文本分析 / 郭葆玲 (89)

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映射

——对小学语文教材课文人物的性别分析 / 杨洁 吕改莲 (99)

科学性别化的构建

——对香港版小学语文教材的性别分析 / 黄河 (111)

漠视女性——对初中语文教材女性形象的分析研究 / 马国义 (126)

对初中历史教材中武则天形象的分析 / 郭楠 (132)

书写女性与政治：历史教材中性别政治意识形态解读

——以中国古代史部分为例 / 余艳 (138)

妈妈和我——初中英语教材中两代女性的性别角色分析 / 赵萍 (154)

2 走进教材与教学的性别世界

澳门中学一年级中国语文教科书性别意识形态之内容

分析研究/卢立涛(164)

港澳地区初中语文教科书中的性别问题研究/黄俏梅(175)

从贤母良妻到平等劳动者

——中国近代初小语文教材中女性形象和角色分析/王毅(189)

试析扫盲教材中性别角色的刻板化/赖立(199)

妇女扫盲及扫盲后教材的性别分析/王素(208)

成人扫盲教材中职业角色的性别分析/曲雯(217)

少数民族扫盲教材中的性别研究/任一明(226)

下编：教学过程、师生互动的性别文化研究

运用分析学原理对幼儿读物的性别分析/布朗·戴维斯(233)

关于澳大利亚和日本儿童阅读“纸袋公主”的研究/布朗·戴维斯(251)

儿童游戏中的社会性别文化分析/张咏(265)

儿童 性别 语文教材/郭力立 赵振洲(276)

相隔一层纸——小学数学课堂中的性别视角透视/陈萍 陈伟玲(288)

谁是好学生——初中理科教师性别刻板印象探析/宋辉(309)

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性别问题研究/张莉莉(319)

打工妹与生活技能教育/李庆(333)

导言 走进教材和课堂教学的性别世界

“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是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表明，在“以人中心”的时代里，课程设计必须折射出教育所承载的“人”的复杂内涵：既是具有特定民族、国家文化积淀和认同的、构成民族整体的“人”，也是作为鲜活个体存在的、具有丰富个性差异的个体“人”。如此复杂的“人”的形成，既有先天生理因素，更有后天社会原因。而在后者中，有目的、有计划、系统进行的学校教育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学校教育这样一种人类社会生活的制度创造使人的“社会化”、“文化化”的实践过程更加有组织、更加系统化和规模化。近代以后，学校教育在个人及国家发展上的功能同时得以彰显，国民教育系统成为国家最基础的建设事业之一。时至今日，教育的内涵日益丰富，教育是所有人都应享有的基本人权的理念也已深入人心。“全民教育”、“终身教育”、“满足基本学习需要的教育”，反映了现代社会在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对象、时限以及性质等基本问题上的理念与追求。

教育是通向人类平等，“促进更和谐、更可靠的人类发展的一种主要手段”（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1998：序言）。然而，正如曾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的斯贝斯先生所说：在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差别中，

2 走进教材与教学的性别世界

最为顽固的当属男女之间的差别，尽管为争取性别平等机会的斗争一刻也未停息过（联合国开发署，1995：序言）。

在学校中，形成有助于实现性别平等和公平的文化环境，通过教育使所有人，特别是女性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能，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特征，也是负责任、有现代意识的国家政府的重要使命。中国政府在2001年5月22日由国务院正式通过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中明确指出：“将妇女教育的主要目标纳入国家的教育规划”，“在课程、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中，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教师培训课程”。在同时通过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中规定：“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教育内容”。这表明，中国政府不但已经意识到教育所承载的传播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现代社会理念和生活原则的重要功能，并已将通过教育实现性别平等与公平的努力具体化到课程与教材的层面。

为深入了解中国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教材及课堂教学中性别平等理念的表
现与实施情况，推动将“两个纲要”的目标和政策条款转变成学校教育现实的进
程，我们于2000年8月申报了“对中国幼儿园、中、小学及成人扫盲教材的性
别分析研究”课题，并获得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支持。项目的研究工作于2000年
10月开始进行。课题组成员包括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陕西师
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国内著名高校
和研究机构的20多位研究人员。

研究的基本目标

1. 通过对现行中、小学课本和相关教学材料中依然存在的性别陈规与刻板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在教育工作者中形成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从性别
的角度对教学材料和教学行为进行反思，使性别平等的原则成为评价教育、教学工
作的因素之一；

2. 通过设计建立在性别平等与公平基础之上的教学计划和参考资料，帮助
教师获得性别平等意识的赋权，将性别平等与公平的理念融入课堂教学实践；

3. 通过向有关部门提供报告、建议，推动将性别视角纳入课程和教材编写
主流的工作；

4. 通过合作研究，增强在性别教育领域中的国际、国内合作。

研究的基本思路

性别是本研究特别关注的问题。女性主义研究的视角和理论自然是不可缺少
的基础之一。在女性主义看来：人虽然生有男女之分，但特定的性别意识和观念

却是后天习得的（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1997），“是通过人类的互动、社会生活而被不断地创造和再造的”（Judith Lorber，1993，转引自郑新蓉，2002：177）。人的性别社会化是从人的出生即开始、伴随着人的生长、由社会中的人持续不断地参与进行的。学校是成长中的儿童性别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学校生活，特别是课堂教学，对儿童的性别社会化发展具有直接影响。在这一方面，本研究特别受到知识社会学、新教育社会学及社会科学领域内解释主义的影响。

“知识是社会建构的”（麦克·F. 杨，2002），“所有知识，尤其是关于同一些对象的一般知识，都以某种方式决定社会的本性，反过来说，所有知识也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马克斯·舍勒，2000：58）。新教育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如是说时，不但挑战了西方近代以来在学界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倾向，将知识还原为一种社会组织中的知识，一种由具有特定社会身份的人所构建和创造的知识，而且，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与社会文化、与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有机联系在一起。

如果“知识是控制”，是“一种社会规定”（麦克·F. 杨，2002：151），那么，以传递知识为使命的学校、教学，也具有了鲜明的社会伦理和文化政治学的内涵。当女性主义者诘问学校传递“谁的知识”、施行“什么样的教育”时，她们将新的本体主义——性别视角、新的认识论——女性的性别经验带入对教育、教学的审视中。这种审视对传统“无性”或“中性”（更被标榜为科学的）的知识和教育研究来说，不但具有挑战性、颠覆性，而且，也相当具有建设性。因为，教育的核心概念是“人”，而人是有思想、有智慧、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存在。人类经验、情感的丰富与多元是人类生产和获取知识的基础和源泉。排斥女性视角、忽视女性经验和诉求的教育实践及研究，不但在本体上有缺失，在认识论层面也存在着严重偏差。女性主义赋予学校、赋予教育性别的视角与框架，正是使教育走入常人世界的真实生活状态，使知识的生产与建构植根于人不同的经验与社会情境之中。

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如何对正在成长中的男人和女人进行社会化？男女学生在学校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如何获得特定的知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将我们引进学校、课堂，从性别的视角对学校的课程、教材，对课堂教学中师生互动进行分析与研究。

根据英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麦克·F. 杨的分析，二战后教育社会学界对教育问题的关注经历了三个主题的变化：第一阶段，主要关注教育机会均等；第二阶段主要研究学校的组织及学生的筛选；第三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关注重点是学校的课程（Michael. F. Young，1998：9—10）。虽然，杨的主题变化及划分主要是针对英国的情况，但也具有普遍性。教育社会学从研究谁进入（什么样的）学校，到关注谁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是研究主题和范式上的重要变化，

关注“什么样的教育”为研究者开辟了一个丰富多彩、变化多端、因人而异、几乎无章可循的领域。在这一方面，建构主义、解释主义的研究路径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

仅以课程和教材而言，课程曾被认为是引领后人沿线性奔跑、跑向更高、更远目标的“跑道”，教材是人类智慧的凝聚，是代表不可置疑的“知识理性”的权威文本，在这一框架之下的教学活动中，教师作为“授”者、学生作为“受”者，其身份是给定的，关系是简单的。教学过程可以视之为设计和操作的、类似机器生产产品式的“程序”。然而，这样的课程、教材与教学观目前已受到多方面挑战，其中，运用后现代视野审视教育的思想家的挑战最有颠覆性。在后现代的挑战者看来，“没有人拥有真理而每个人都有权利要求被理解”。教师的角色不再是原因性的，而是转变性的。课程不再是跑道，而成为跑的过程自身。学习则成为意义创造过程之中的探险（小威廉姆·E·多尔，2000：中文版序）。

强调教学的意义生成过程，并非否定教材作为“法定文化文本”的重要性。事实上，当英国社会学家伯恩斯坦提出“文化资本”、“文化代码”的理论以后，以教科书、教学语言等形式所呈现出的规范知识的表现形式，其文化内涵及其对不同学生的不同影响，已广泛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后现代主义所要突出的是课程和课堂教学的“开放性”、包容性及扩展性。课堂教学不是简单的“法定文化”的复制与传递，而是师生之间、课堂教学中的每一个人之间，在各自经验、期待与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冲突、协商与交流，对文化代码的意义生成和知识建构过程。教师对教材文本的讲解是教材信息意义生成的重要途径。教师自身的性别意识观念、表现这种意识观念的自身性别角色定位及其对学生的辐射和迁移，有可能对学生的性别社会化产生“正向”或“负向”影响。学生解读教材的过程，同样是意义生成的过程，这种生成既不是现实生活的简单反映，也并非与之毫无关系。主体对所学内容的理解既可以看做是外部世界有力塑造他们的证据，也可理解为自身将外在知识内化并重新整合建构的结果。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是具有主体意义的存在。他（她）们对自身和他者的性别角色定位、价值判断，并不完全是外在的、知识层面的获得。个体内在性别意识的觉醒、情感的参与也是不可缺少的。对教材及教学活动的性别分析视角给参与者提供了反思自我、激活内在性别意识的机会，它为由内向外、由己而人地创造更平等公平的社会性别环境准备了不可缺少的条件。

研究的基本方法

1. 定量研究：通过对现行教材的插图、标题、主角等进行不同性别人物出现的频次统计，来展示教材对不同性别人物的呈现状况。

2. 质性研究：通过访谈有关教材编写者、教材使用者（教师、学生），通过课堂教学活动的观察等活动，深入了解教材编写的基本思路、理念以及对这种思路、理念的理解和执行情况。

3. 文本分析研究：对教材中，特别是语文、政治、历史、社会、思想品德等教材中用文字形式出现的带有性别色彩的内容进行文本分析，以揭示教材所蕴涵的性别社会性意义。

4. 历史比较研究：对不同历史时期同类教材中的性别问题进行历史比较分析。例如，选择不同时期小学或初中语文教材，分析其中所呈现出来的女性角色。以此来纵向表现社会因素所形成的性别角色在教材中的反映。

5. 专题研究：综合定量的、文本分析的和历史比较分析的多种方法，对一些专题进行研究。如教材中的母亲形象、领袖形象等，以更深刻地揭示教材中不同性别角色的文化涵义。

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背景

性别：人的社会（文化）属性的重要标识

性别大概是最早将人区别开来的指标。阶级、种族、民族、国家等区别远在其后。人作为社会、文化动物，与动物的本质不同是：动物仅仅靠体内的生物遗传基因，遗传着生存本能，而人类除了体内的生物遗传基因外，还有体外的“文化遗传”、“社会遗传”，这一过程也可被称为“濡化”（吴康宁，1999：51）。在性别问题上，前者形成了人作为生物体而具有的生理性别（sex），后者则造就了人作为社会动物而特有的社会性别（gender）（西蒙娜·德·波伏娃，1997）。虽然人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有着内在联系，虽然学术界对“sex”、“gender”的具体内涵、甚至对这两个外文词汇的中文译法有着不同看法（李小江等，2002：导言），但人类性别的复杂之处在于其社会性，因此，（社会）性别是思考人类性别问题的重要标识。

近代以来，许多学科、学派都涉及到对人的性别问题的研究。强调性别形成的生理学机能的学派试图从人的生理构造、遗传基因等方面找到造成人性别区分的主要原因，信守环境认知和行为主义学说的人则认为人的行为强化是性别形成的决定因素，另外由心理分析理论发展而来的“性别角色自居”理论，建立在认知发展理论基础上的“性别归类”，或“性别认同”说等都表明人们在解释人的性别形成问题时所采用的不同理论工具。马克思主义把性别放在社会的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的框架中进行分析，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性别的社会关系和内涵的重

要思路。在这一问题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女性主义的观点（鲍晓兰，1998；刘霓，2001）。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一些有影响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在保持女性主义看待世界、分析问题的独特视角的同时，广泛吸收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拓展女性主义的研究领域，不仅使女性主义的研究“集中在妇女研究对妇女的意义上”，而且，探讨“为了一种社会制度的整体性，我们如何把人类两部分之间的关系组织起来”的理论与实践。这后一方面，由美国女文化人类学家艾斯勒于1987年出版的《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它“从一种性别整体论的观点重新考察人类社会”，此书的主旨，正如作者在该书前言中所说：“不是要让妇女反对男人，或是让男人反对妇女，而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组织——伙伴形式的社会组织”（理安·艾斯勒，1995：前言）。

“性别”在社会和历史意义上的含义是什么呢？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发现之一就是：性别并不是纯粹自然的产物。“我们所认为是‘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人造的，是由社会制度和把该社会制度解释为自然和生理决定的东西。”（王政，杜芳琴，1998：88）这样的观点在波伏娃的代表作《第二性》中被精辟地概括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生成的。这一脍炙人口的名言引发了人们对生成女人（和男人）的社会生活环境、家庭和国家机制、历史文化传统等进行深入研究。在这一问题上，其实不仅女性主义者，很多男性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和学科领域予以论证。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在他旁征博引的作品《文明的进程》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说明：包括男女生活方式、两性关系及对男女两性关系的看法等在内的所谓“文明人”的行为方式，并非与生俱来，不同时代人与人相处的“礼节”、“礼貌”等文明行为结构，不但表现了人心理状况的变化，而且，“与国家组织形式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诺贝特·埃利亚斯，1998：1卷，53）人作为社会动物，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并与和他（她）有关的其他社会成员共同经营着社会生活。个人在特定社会结构与体系中的位置，或者说身份、角色，并不是天生的或自为的，而是被赋予的。国家，靠行政管理上的权威性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影响力，对不同（性别、阶级、阶层、民族、年龄等）的人在行为、观念的认同上起着巨大作用。而赋予人们（性别）角色和身份的，特别是其合法性的还不仅仅是这种外在的权威力量，更有已经内化于人自身、浸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使人不可抗拒的文化、传统和心理认同的力量。人们接受自己的角色安排，“相信它是我们自愿的结果”。这种无形的力量——被布迪厄称之为“惯习”，是福柯所说的“社会凝视”——对人的行为与意识具有强大的约束力。社会权力与惯习结合，共同构成了对人的“无限期的规训”，正如福柯所说“权力以符号学为工具，把‘精神’（头脑）作为可供铭写的物体表面，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福柯，1999：113）。因此，女性主义者强调，要把社会性

别当做社会制度来理解，要理解其构成的结构、多种要素及社会分层的功能。

欧洲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彼德·伯克在《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一书中提出：如果说男人和女人间的区别主要是文化上的，而不是天然的，如果说“男人”和“女人”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各不相同地定义和构造的社会角色，那么，历史学家就身负重任了。他们应该对“性别的社会和文化建构进程进行历史审思”，需要阐述“居于支配地位的性别惯例”（彼得·伯克，2001：64，63）。福柯运用“权力—知识”的观点来分析人类的性和性别关系。在他看来，“性是现代权力活动的核心”，每一种知识都在权力的操纵下建构自己的现实和真理。他的双重兴趣——对理性形式和权力分析的兴趣——从一开始就被用来揭示影响性活动和性别关系的社会规则和机制。英国学者杰弗瑞·威克斯曾这样来概括和评价福柯等人在性史研究上的成果：人们认识到不能再把性看做与自然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历史研究主题。把性看做“社会建构”或“历史发明”迫使我们超越现存的种类边界，去探索它们的历史产物。（杰弗瑞·威克斯，2002：16）

上述学者的研究代表了历史发展到20世纪，人们在性别问题上的基本认识：性别不仅是自然的结果，还是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产物，它也是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学者，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学术渊源，只要接受了社会性别（并非一定要使用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就意味着同时认同了这样的理论预设：如果性别的建构是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产物，如果我们能够弄清楚社会性别的出现及繁衍的机制，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改变它们。这不但是—种很有冲击力的学术思想，还代表了一种相当积极的生活态度。

如果说，以人为中心反映了现代社会生活和思潮的重要特征，那么，对人的性别问题的研究自然也成为学界关注的主题之一。曾有社会学家这样来形容性别研究的重要性：以前，性和性别顶多像个幽灵存在于社会史中，但现在它越来越被视为了解现代社会动态的一个关键因素。它已处于道德、社会和政治话语的中心。（杰弗瑞·威克斯，2002：1）

教育与学校：人的性别社会化的重要场所

教育是文化传承活动，是将作为“生物的人按照一定社会文化的要求教化为社会人的过程”（司马云杰，1986：472），也是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塑造“社会的我”的过程。集中承载教育力量的社会化机构——学校是使“自然的我”变为“社会的我”的重要工具，福柯所说的使个人“成为其中之一”的道德规训力量在这里充分得以体现。社会性别是社会人的“文化属性”，也是人类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因此，它在后天学校教育中具有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并非所有